

# 论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sup>\*</sup>

卢厚杰

**摘 要**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商是我国私家藏书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藏书家群体,但受材料所限,目前学界未能开展充分的学术研究。笔者利用地缘优势,借助地方文献查阅和田野走访,全面揭示出当时晋商的藏书活动及文化贡献。明清民国时期,晋商藏书家的收藏、整理、著述、刊刻、捐书等活动,对传统古籍的保存传播、乡邦文献的搜集编印、三晋学术文化发展以及近代山西新式图书馆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晋商藏书家“藏以致用”的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晋商“儒贾兼通”商业特质的塑造和三晋近代新文化的流播。参考文献 25。

**关键词** 明清民国 晋商 藏书活动 文化贡献

## Research on the Book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Shanxi Mercha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u Houjie

**Abstract:**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re the collectors of the boo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but by the limi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have not fully exploited their academic connotations. Using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 with local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this paper tries to fully reveal the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Shanxi Merchants. The collection, collation, writing, engraving, dona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book collection by the Shanxi Merchant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ancient book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tate literatur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Shanx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library in Shanxi. The idea of “collecting for using” by Shanxi Merchants has given a big push to the shaping of business feature of “master in both scholar and merchant” and the spread of new culture in modern Shanxi. 25 refs.

**Keywor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Shanxi Merchants; Book Collection; Cultural Contribution

明清民国时期,传统商业高度发达,商人与商帮规模庞大,立足于海内外贸易和金融票号业经营的晋商长期执商界牛耳,是当时民间财富力量的主要代表,拥有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晋商尊崇“儒贾兼通”“藏以致用”的文化理念,热衷于图书收藏、整理、使用、刊刻和捐赠等活动,这些举动对传统古籍文献的保存传播、乡邦文献的搜集编印、三晋学术文化的发展以及山西新式图书馆的建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事

实表明,晋商作为山西历史舞台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社会群体,其私家藏书和文化传播活动对三晋地域文化的塑造意义非凡。

以往研究侧重于简单梳理晋中地区晋商藏书家的藏书活动<sup>[1]</sup>。从学术实践层面而言,部分研究既未能从宏观角度系统概括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整体状况,也忽视了对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私家藏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的深度探讨。基于此,笔者利用地缘优势,利用田野调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敦煌写本斋文的精神世界与敦煌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项目编号:14BZS076)和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唐朝基层税役征管危机应对研究”(项目编号:QN-2017005)的研究成果之一。

查方法,并参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谱牒中心所藏明清晋商家谱、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搜集的民间文献、山西省各地方志以及山西省各级图书馆藏晋商捐献古籍文献,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明清民国时期晋商藏书活动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通过透视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私家藏书活动的荣衰,挖掘其间所蕴含的历史智慧。

## 1 保存传播古籍文献

明清民国时期,晋商私家藏书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珍孤善本,且依托家族雄厚的经济基础,刊刻出版大量图书文献。晋商通过图书收藏、整理、刊刻等活动,为古籍文献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今日,山西省内各级图书馆仍藏有晋商后人捐献的许多珍贵古籍,其中不少善本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明清晋商私家藏书数量庞大,如灵石王家、太谷赵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介休侯家等晋商大族均肆力收藏图书,而尤以祁县晋商何家、乔家和渠家藏量最丰。何尊先是清后期山西著名藏书家、刻书家,他曾在祁县城东筑有名为“对蒙轩”的藏书楼,藏书万卷有余。晋商乔家自清初开始藏书,至清中叶时,乔氏“黄叶楼”已是典藏丰富的藏书楼<sup>[2][217]</sup>。至光绪十年(1884,“在中堂”的乔致庸向子弟交接家族商业,专心于家族藏书和子弟教育,“肆力史册,广购图书”<sup>[3][135]</sup>,其用心经营的“有融斋”“息影院”均成为藏书万卷之所<sup>[1]</sup>。乔氏“保元堂”的乔超五嗜好收藏古籍,是晚清华北十大藏书家之一,所藏古籍多达六十余箱<sup>[1]</sup>。渠家藏书始于乾隆年间,清代著名书法家张思叟曾为渠家藏书楼书写对联“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sup>[4][33]</sup>,借《左传》典故夸赞渠家藏书之丰。20世纪初,渠家收购山西最大私人书坊——“书业德”,改名为“书业诚”,主营古籍、书画、文物买卖,收购所得珍善古籍多归渠氏家藏,通过这一藏书方式,渠仁甫在十余年间便积累古籍善本2000余部、10万余册<sup>[5]</sup>。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晋商后人何晓楼、乔贞士与渠仁甫先后向祁县人民文化馆捐献私家藏书共2万余卷、4万余册,如此丰富的古籍文献是祁县晋商乔家、渠家与何家累世藏书的宝贵心血,为传统古籍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清民国晋商藏书内容丰富并颇具特色,除保存大量经史子集类古籍文献外,传统藏书家不甚重视的金石、书画、碑帖等亦是晋商私家藏书的重要内容,许多珍贵的书画、碑帖被晋商高价收购并传承后世,这无疑弥补了传统藏书家藏书活动的缺憾。祁县晋商乔家的乔映南,一生嗜好金石、碑帖收藏<sup>[6]</sup>。乔氏后人乔贞士向祁县人民文化馆所捐古籍文献中,就包含有许多金石碑帖,如赵孟頫《道德经小楷帖》、许嗣永《许嗣永临圣教序》、文征明《南山十咏》、董其昌《书锦堂记》、刘鏞《清爱堂法帖》<sup>[7]</sup>。祁县富商渠仁甫善书法,尤擅小楷,加之家境富裕,收藏的名人书法及著名碑帖十分丰富,除少数是祖传藏品外,大多数是通过“书业诚”商号从祁县戴廷栻、太谷孙阜昌、代县冯志沂、平定李古人、高平张承纶、祁县渠爵庵、太谷曹铁轩、临汾毛圣宗等著名书画收藏家后人手中购得<sup>[8][159]</sup>。后将600余幅书画作品捐献给山西省文化馆,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馆的书画馆藏资源。太谷曹家坐拥600余家商号、票号,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家业财力雄厚,族人曹克让精通金石书画,痴迷名人字画收藏,高价收购历代名人字画一百余幅,其中不乏稀世真迹,最珍贵的是明代画家仇英仿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sup>[3][199]</sup>。再如民国时期山西著名书法家太谷赵铁山,与吴昌硕并称“南吴北赵”。自清末至民初,赵氏用于购买书画碑帖的开支有七八万元之巨,历代名家碑帖书画收藏极富,包括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傅青主手批明拓《曹全碑》、唐拓《石经》等珍品<sup>[9][25]</sup>。

明清晋商私家藏书保存了许多稀见古籍善本,藏书价值颇大<sup>[10]</sup>。其中,何家“对蒙轩”藏书楼所藏善本古籍最多,如何晓楼捐赠的《昌黎先生集考异》是海内外孤本,刻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有汲古阁毛氏、季振宜、徐乾学等藏书家

印 45 个,是目前山西省内仅有的一部保存完好的宋版书<sup>[11]</sup>。何晓楼捐赠的明前期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赵府居敬堂刻本《资治通鉴纲目》、明嘉靖刻本《王氏家藏集》、明成化七年(1471)刘紆刻本《圭斋集》、明嘉靖十二年王献等刻本《溪陂集》、明嘉靖二十八年周国南川上草堂刻本《周恭肃公集》、明正德九年(1514)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御选唐诗》等珍本,均已入围《国家珍贵古籍目录》<sup>[10]</sup>。渠仁甫捐赠的古籍大多是珍本、善本,如明代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陆状元通鉴》等大型著作,以及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大明一统志》、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唐类函》和《图书编》、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资治通鉴》、明崇祯五年(1632)刻本《潜确类书》和清康熙年间武英殿本《南巡盛典》《御撰周易折中》《钦定佩文韵府》《五色批古文渊鉴》等<sup>[8][108]</sup>。乔贞士捐赠的珍稀古籍包括清抄本《涑水记闻》二卷、清乾隆三年(1738)武英殿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明二色套印本《四书参》十九卷、明刻本《雪牕谭异》八卷图一卷等<sup>[10]</sup>。

此外,明清民国晋商还经常刻印图书嘉惠士林,这一举动对于古籍文献传播和学术文化交流颇有助益。如光绪七年(1881)六月,祁县晋商何乃昌刻印出版《迹古斋》一书,内容为王太史、黄县令的楷书真迹<sup>[12][24]</sup>。光绪十二年(1886),何家“对蒙轩”藏书楼主人何尊先主持刊刻《四库全书目录》四十五卷,后附《四库未收书目》《简明书目校勘记附简明书目》<sup>[13]</sup>。民国初年,祁县晋商渠仁甫的“书业诚”商号经营刊印业务,制造“晋人刻木活字”一套,字号分大、中、小三类,共有近 30 万枚,用于印刷出版各类书籍,渠家所刻木活字印刷本存世图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等经典文献<sup>[14]</sup>。

## 2 收藏整理乡邦文献

明清民国晋商藏书家致力于乡邦贤哲文献

的收藏,并热衷于编纂、刊刻乡梓先哲和文化名人的诗文著作,由此使得许多山西地方文献得以留存和传承,可谓是乡邦文献收藏、整理和传播的典范。

晋商收藏的山西各地方志资源十分完备。祁县何家收藏有清雍正十三年(1735)《泽州府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朔平府志》、清雍正十二年(1734)《西湖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祁县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潞安府志》、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汾州府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蒲州府志》<sup>[10]</sup>。其中,何晓楼所捐明万历纂修、崇祯二年(1629)重印的《山西通志》,扉页题写“祝徽编山西通志/明崇祯二年刻/昭余何氏对蒙轩藏”。明崇祯刻本《山西通志》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海内外仅存两部<sup>[15]</sup>,一部藏于山西省图书馆,另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影印编入《中国稀见地方志汇刊》<sup>[1]</sup>。

晋商藏书家也注重编纂地方文献。民国初年,《清史稿》编纂工作开启。1915年,山西学者陈敬棠等成立“山西文献征存局”,征集乡梓文献,榆次晋商常家的常赞春被聘为编辑,参编《山右丛书初编》。民国二十二年(1933),常赞春主编修成《山西献征》地方文献丛书<sup>[3][248]</sup>,此书稿件和体例编排大多出自他手,全书共八卷,撰写了清季山西 230 多位著名人物的传记,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sup>[16][359]</sup>。此外,晋商藏书家热衷于县志编修。如民国初年,祁县渠本翘纂修《祁县县志》,惜乎未竟而亡。民国十三年(1924),太谷藏书家赵铁山参与《太谷县志》编辑事宜<sup>[17]</sup>。民国十九年(1930),介休晋商侯允治参与编修民国《介休县志》,成书二十卷<sup>[3][81]</sup>。民国三十年(1940),榆次常麟书、常赞春修成《榆次县志》二十卷,首次收录地方风貌照片,突破传统方志编修体例,成为民国山西地方佳志之一<sup>[18][762]</sup>。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谱牒研究中心藏有大量明清家谱,许多晋商家谱均由族人修订。如灵石晋商静升王氏,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王中极将其父王梦鹏于乾隆十九年(1754)在康熙版《王

氏族谱》基础上重修的族谱定稿、付梓。卷一为凡例、目录、世系总图,卷二为世系总图,卷三至卷十七为各派世系图,卷十八为封典考、忠义考、节孝考、名位考,卷十九为坟墓考、宗祠考、坊表考,卷二十为艺文考、后序<sup>[19]</sup>。《艺文考》留下大量家族史料,包括传 32 篇、表、记、行状、墓志铭等 13 篇和序、跋、赞 12 篇及诗 15 首<sup>[3][13]</sup>。榆次常家族谱亦出自族中学者之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常万慧成为常家第一部《族谱》的总纂和作序者<sup>[3][223]</sup>。光绪二十二年(1896),常立纪再次组织修订宗谱。民国九年(1920),常赞春编修《常氏宗谱》一百五十卷,装订成铅印本六册,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民国十四年(1924),常赞春等又修成《常氏家乘》六卷,铅印本,现藏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

明清民国晋商藏书家编辑、刊刻了许多乡邦贤哲的文集。如何尊先醉心于搜集山西古诗,刻印出版《山右唐诗》(二十册)和《山右宋金元诗》(十三册),还曾撰辑、刊刻《山右四影诗》《王太史稿》《山右金石文钞》等地方文献<sup>[12][24]</sup>。渠本翘晚年刊印了祁县学者刘奋熙的《爱薇堂遗集》和戴廷栻的《半可集备存》<sup>[8][26]</sup>。《半可集》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戴廷栻的著作,原刻十卷,但已散佚。1916年,常赞春辑录残本,渠本翘、乔锦堂助资刊行《半可集备存》。全书辑录散文一百余篇,以及寿序、祭文、哀辞等杂文数篇,载有戴廷栻对老、庄、申、韩四子及《广成子》《阴符经》《楞严经》等书的论述,多有精辟独到之见,并附有傅山代为编辑的数十首诗及叙<sup>[2][691]</sup>。除此之外,晋商藏书家还刊印不少地方文化名人的著作,如光绪十七年(1891)刻印著名藏书家乔超五撰写的四卷本《有融斋遗稿》,民国十九年(1930)渠仁甫、常赞春刊印出版乔尚谦的《息影院诗存》。藏书家赵铁山的著作如《读汉书杂咏》《心隐庵四体书》《太谷县志略》《急就章》《续千字文》《说文建首叙》,以及常赞春的著作如《柞闲吟庵金石学谈》《文字学》《文字谈》《葱宦语故》《葱宦诗集》《古泉考》等<sup>[1]</sup>,先后自主石印出版。

### 3 促进三晋地区学术研究发展

晋商藏书家讲求“藏以致用”,许多晋商后人批阅藏书、编目校勘、著书立说、交流学术,促进了明清民国时期三晋地区学术研究的发展。如清末民初,太原士绅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云“商贾之中,深于学问者亦不乏人。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值内有高贤,信非虚也”<sup>[20][312]</sup>。事实表明,得益于丰富的私家藏书,明清民国许多晋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在文学、经史、目录学、算学、书学等领域成绩斐然,并与国内著名学者交流颇广,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

清末民初,晋商常家在学术上建树最高,涌现出不少名士学者。如十三世的常立屏,“学问渊博,凡家藏善本,不惜购以巨金,所居室备储四部各书……邃于史纪事本末,通鉴辑览,各书丹黄”<sup>[21][9]</sup>,常与本县儒生侯汝宽、林蕙同读史鉴,互为辨析。常立经“葺精庐,拥图籍,酷嗜宋诸儒书,于邵氏皇极经世尤为妙契”<sup>[21][9]</sup>。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究心考订学,于《皇清经解》《印雪轩随笔》《曾文正文抄》均有识语或考订”<sup>[21][9]</sup>。常立方“习好史籍,兼究金石”<sup>[21][9]</sup>,著有《抱守斋金石文字记》。十四世的常麟书进士及第,博学多识,是常氏学者群的代表性人物,先后印行所撰《左腴类聚》《礼记易解录》《诗经述义》《尔雅述义》《中字知源录》《秦汉郡州任职谱》等十数种经史学术专著<sup>[3][247]</sup>。十四世的常赞春为清末民初山西学界领袖人物,一生著述颇丰,存世的有《毛诗雅故集》《诗传集例》《虚字辑谈》《文字达指》等十余种,尤以《诗经》研究最有建树;同时,常赞春精于版本之学,通过对比古今各种版本书籍,认为“唐以来统治者对政治的需要而选定的‘钦定本’未必是最佳本”<sup>[18][761]</sup>,这一论断颇有价值和启发。十六世的常燕生在新学方面造诣颇深,民国十三年(1924),26岁的常燕生受聘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与胡适、陈独秀等学界名流交往甚多。他学识渊博,勤于著作,著有《中国史鸟瞰》《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

观与唯物史观》等。1956年,他的学生黄欣周在台湾整理出版了《常燕生先生遗集》<sup>[3][250]</sup>。

灵石王氏和代州冯氏家族学者云集,在学术上亦均有一定造诣。如灵石王筵宾,“暇则手一编,博览群书,音韵、算学、星经、地志,无不通晓”<sup>[22][72]</sup>;又如乾隆年间的王梦鹏,“专心汲古,于书无所不读,即严寒酷暑,非三鼓就不就寝,尤究心于濂洛关闽之说”<sup>[22][72]</sup>;再如以学识名闻乡里的王凝五,“其设教也,以小学、孝经为门户,四子书、五经为根柢,而博之以诸子百家之说”<sup>[22][75]</sup>。代州冯氏族人冯伯高“淹贯群书,而于程朱之言尤为酷嗜,暇时日与知交讲论,触类引申,多出人意表”<sup>[22][87]</sup>;冯培庵“肆志于学,尽通群籍”“慨然以古学者自期”<sup>[22][72]</sup>;另一族人冯秋水“取王鲁齐柳道传诸遗集,梓之,置学宫,与范子骧、陈子今圣、祝子基阜、颜子天颜辈,赋诗讲学,著《春秋大成》,学者宗之,前后说《春秋》者,弗能曲已”<sup>[3][87]</sup>。

晋商藏书家对清代目录学的学术发展颇有创益,如祁县晋商何尊先对《四库全书》的目录研究造诣颇深。清光绪十二年(1886),祁县何氏“对蒙轩”刻本《四库全书目录》四十五卷出版,后附《四库未收书目》和《简明书目校勘记附简明书目》。学者王书豪认为“何氏此书系四库书名目录,一依《提要》编排之旧,删去提要,但著书名、卷数、著者,并施案语。是书版心镌某部某类,颇便翻检,当即其大用所在,书前凡例云‘全书为目录之书,列卷二百,阅者每苦于繁重。兹编又为目录书之目录,由是编以窥全书,寻检较为便也。’并对《四库全书总目》讹误之处予以订正,或考书卷残阙,如《徐氏海隅集》四十卷,何氏案语云‘予藏本分为三编,共八十五卷,此为残本’;或论其书分合,如《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内台集》七卷,何氏案语云‘予藏本六十五卷,《内台集》附集后’”<sup>[13]</sup>。

此外,明清晋商在算学领域也颇有成就,这与经商讲究计算是分不开的。如明代蒲州盐商张四教“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皆按籍妙解”<sup>[22][89]</sup>。

代州晋商冯家的冯敬南“尤精算术,测高量远,求探推计古今,伸手布筹,咄嗟立办。世传九章书与西洋算法,人或辗转莫解,君一览立剖,辄指画令,人人可晓”<sup>[22][88]</sup>。其族弟冯疆斋跟他学习算学,“究心经济、勾股及九章算法”“得昔人之秘”<sup>[22][88]</sup>。五台晋商徐家的徐枚儒在算学领域颇有造诣,史谓“多才多艺,尤精九章算术,如勾股少商之类,人穷年不得解,公布指即得”<sup>[22][89]</sup>。榆次常家的常立爱钻研史学、理学之外,也沉心数学研究,“藏书多为史学、理学等,且究数学”<sup>[21][9]</sup>。

清代晋商藏书家在书学领域造诣颇高,如榆次常家的常赞春、常旭春,太谷赵家的赵铁山,书法艺术精湛,均是三晋地区有名的书法家。其中,太谷赵铁山对传统书学理论颇有新知卓见,在阅读蔡邕、王羲之、欧阳询、傅山、包世臣等中国古代名家书论的基础上,赵铁山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炼书论认知,认为“学古之意,意贵有形;我书之意,意贵无形。有形之意为成法,少变化,必造到无形之意,大而化之方为真意。前贤论述有曰‘胸中有古人,下笔无古人!久之,则下笔作字,我用我法,自不致为古人形貌束缚也’”<sup>[23]</sup>。民国八年(1919),赵铁山石印出版书论专著——《心隐庵四体书》,“不拘时代,无次先后,只取其获我心,足饷后学”<sup>[24]</sup>。

#### 4 参与新式图书馆建设

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华夏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困局和挑战,许多有识之士高呼“启迪民智”“救亡图存”,尤其是清末“新政”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新式图书馆的成立和建设<sup>[25]</sup>。在风起云涌的变革年代,三晋大地上藏书最丰富的晋商及其后人积极投身于地方新式图书馆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传播。

清末,晋商常家后人、著名藏书家常赞春认为“今日道丧文弊,使读书种子不绝于人寰,亦云幸矣”<sup>[16][356]</sup>。因此,他将大量家藏古籍捐献给

新式图书馆,以提升教育水平和促进文化传播。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常赞春将家藏《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子集》《昭明文选》《朱子全书》等古籍图书捐给新建的凤鸣学堂图书馆(后归入榆次县文庙图书馆),一时誉满晋中,山西巡抚恩寿题赠“士诵清芬”、提学使锡嘏题赠“分惠士林”,以示嘉赏。常赞春后又购置大量新书,捐献给榆次县教育局及本村小学等,以供学生、孩童阅览。此外,他还向山西省图书馆捐赠珍藏的《四部丛刊》及方志等古籍文献,共计20 000余册<sup>[16][356]</sup>,极大地丰富了山西省图书馆的古籍收藏。

民国时期,晋商藏书家对当地新式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民国元年(1912),太谷赵铁山将部分藏书捐赠给太谷文昌宫图书馆(即太谷县图书馆前身)<sup>[9][79]</sup>。民国十五年(1926),祁县渠仁甫在县城羊树坡街购置房产,成立竞新图书馆,并向其捐赠家藏古籍文献10 000余册,又购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及其他新书<sup>[3][174]</sup>,同时订阅报刊杂志,使其成为一所馆藏丰富的新式图书馆。更重要的是,该图书馆除供渠家建立的竞新小学堂的师生阅读外,还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有力推进了当地新式文化的传播,成为当时山西省内声誉卓著的公益图书馆<sup>[8][73]</sup>。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晋商后人纷纷将私家藏书捐赠给公立图书馆。如1950年,祁县何家后人何晓楼将“对蒙轩”藏书楼钥匙及所藏典籍全部捐给祁县人民文化馆,共计2662函、21 451册<sup>[10]</sup>。1954年6月,乔家后人乔贞士将部分藏书捐献给祁县人民文化馆,共计有366种<sup>[10]</sup>。1955年9月28日,渠仁甫捐赠祁县文史馆书籍手续办理完成,共计捐书120种、477部、11 400余册<sup>[4][35-36]</sup>。据统计,祁县晋商何家、乔家与渠家后人先后向祁县人民文化馆捐献大量私家藏书,共计4865函、38 901部<sup>[12][115]</sup>,使祁县图书馆成为以古籍收藏为特色的国家一级图书馆。又如,太谷藏书家赵铁山的后人将赵家“絅斋藏书室”珍藏的古籍文献和碑帖字画全部捐给山西省图

书博物馆,共计36 400余件<sup>[9][79]</sup>。1954年,榆次晋商后人常凤铭按照其父常赞春的生前遗愿,将其寄藏于榆次文庙的2000余套图书,全部捐献给当时的山西省图书博物馆<sup>[16][360]</sup>。1955年底,在将部分藏书捐给祁县人民文化馆后,渠仁甫又将剩余的554部藏书<sup>[4][36]</sup>和600余幅珍贵书画<sup>[3][174]</sup>捐赠山西省文化馆。

## 5 结语

明清以降,传统商业高度发达,商人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在私家藏书上也有诸多表现。随着财富积累的增加和儒家文化的传播,晋商家族肆力收藏古籍图书,形成累世藏书风气,而且无论从藏书数量抑或质量来看,晋商私家藏书的历史地位均值得世人瞩目。在这一基础上,明清民国晋商藏书家在古籍保存传播、乡邦文献整理、学术文化发展以及新式图书馆建设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晋商藏书家将“藏以致用”的价值理念运用到极致,这不但对晋商“儒贾兼通”家族特质的形成和三晋地域文化的塑造意义卓著,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私家藏书惟有“致用”,方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 参考文献

- 1 韩丽花.晋商中的藏书家——以晋中地区为例[J].晋图学刊,2014(6):47-50.
- 2 祁县编纂委员会.祁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 程光,盖强.晋商十大家族[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
- 4 乔俊海.明清晋商人物·祁县帮[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 5 郑梅玲.祁县图书馆古籍藏书源流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6(2):40.
- 6 曹煜.祁县老照片[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62.

- 7 祁县人民文化馆古籍组.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M].手抄本.祁县:祁县人民文化馆,1955:80-81.
- 8 武殿琦.渠荣录.渠仁甫传[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 9 郭齐文.书法家赵铁山[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0 韩丽花.山西省祁县图书馆古籍述略[J].山西档案,2016(2):5-7.
- 11 祁县图书馆善本组.山西祁县图书馆发现宋版《昌黎先生集考异》[J].文物,1979(11):95.
- 12 范维令.晋商巨族:祁县何氏家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3 王书豪.清光绪十二年祁县对蒙轩刻本《四库全书目录》[EB/OL]. [2017-04-26].  
<http://www.qxtsg.mh.libsou.com/newslst?cid=17>.
- 14 孟苗.太原现30万枚“晋人刻木活字”为清代旧物[N].山西日报,2014-04-22(12).
- 15 薛愈.山西藏书家传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107.
- 16 李新文.常门鸿儒——常赞春[C]//高增德.晋商巨擘: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 17 陈佳.太谷旧志探研[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11.
- 18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中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 19 张国华.灵石静升《王氏族谱》札记[J].沧桑,1999(3):50.
- 20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21 程光梅生.儒商常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
- 22 郭三娟.晋商五百年·崇儒重教[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 23 郭齐文.铁笔松风赵铁山[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4.
- 24 丁国周.赵铁山书法艺术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2:10-12.
- 25 龚蛟腾.清末至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勃兴与繁荣(上)[J].图书馆,2011(1):1-6.

(卢厚杰 讲师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收稿日期:2017-05-01